

第一章 引论

第一节 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基本问题和理论范式^①

任何学术研究的展开都是基于人们提出了一些被认为是具有意义的学术问题，然后从学术的角度去回答它、解决它，并用一整套为人们所接受的学术语言表达出来。明清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当然也是如此，即人们首先提出了一些被认为是关于明清社会经济史领域中有意义的学术问题，然后试图通过仔细地搜集证据、准确地解读史料文本来予以回答，这便构成了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内容。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说法，论述的是网络而不是网络所包含的内容，这就是说，一切的研究文本，与其说是反映和表达了客观事实的真相，还不如说是以逻辑的形式通过语言文本来试图重构所谓的客观事实真相，而通过语言文本所重构

^①在现代科学哲学史上，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首先提出了“科学范式”这一概念；“范式”(Paradigm)一词来自希腊文，表示词形变化的规则。托马斯·库恩借以用来说明他从科学史研究中获得关于科学发展的某种规律性的模式。科学“范式”(Paradigm)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一定时期内科学共同体“看问题的方式”，包括共有的方法论、信仰和价值标准；二是科学共同体一致接受的专业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取得的重大科学成就，包括可以进行逻辑和数学演算的符号概括系统。托马斯·库恩是从科学史研究中得出这结论的，但如今人们认为也适用于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但就其基本的内涵和外延尚有不尽相同的看法。本文所使用的“范式”这一概念正是来自托马斯·库恩，其内涵即包括以上两个方面。参见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李宝恒、纪树立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上海，1980年；《必要的张力》，纪树立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福州，1981年。

的所谓的“客观事实真相”与历史经验中实际存在的客观事实真相并非一致甚至不可能一致。这一点，得到了萨义德的强有力的支持。他强调：

“真正的问题却在于，究竟能否对某个东西进行正确的表述，或者，是否任何以及所有的表述，因其是表述，都首先受表述者所使用的语言，其次受表述者所属的文化、机构和政治氛围的制约。如果是后一种情况（我相信如此），那么，我们必须准备接受下面这一事实：一种表述本质上（*eo ipso*）乃牵连、编织、嵌陷于大量其他事物之中的，惟独不与‘真理’相联——而真理本身也不过是一种表述。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这一事实迫使我们认识到表述（或错误的表述，二者之间的差异至多只是一种程度上的差异）里面包含有一片公共的游戏场（*field of play*），决定这一游戏场的并不只是某种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共同对象，而是某种共同的历史、传统和话语体系。”^①

这是一种所谓后现代的极端相对主义观点，按照这一逻辑，历史研究即无所谓仔细地搜集证据、准确地解读文本了，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实事求是”了。一切的表述仅仅反映着历史学家的文化趋向，都是时代流行话语体系的一部分，实质上都是一种‘假象’而不是真理，其差异充其量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也就是说，所有的社会科学理论包括史学理论，都只是为某种流行话语体系提供支持而已，与真理无涉。这对于长期以来兢兢业业、试图探寻历史真相的史学工作者而言，无疑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这无论如何都是无法令人接受的。

然而，萨义德的说法并非一派胡言，毫无说服力。如果我们认真地反思一下关于明清社会经济发展和变迁的学术研究史，我们就会发现，虽然萨义德的说法并非完全是准确的，但也具有相当说服力和警醒作用。

长期以来，人们在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发展和变迁过程中，无论是所提出的基本问题，还是所运用的社会科学理论（这两者实际上是密不

^①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第349页，三联书店，北京，1999年。

可分的)几乎都源于西方。这是与特定时代背景紧密相联的。正如克罗奇所强调的: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人们之所以去认真研究和探讨明清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变迁,与其说是为了探寻历史的真相,还不如说是为了理解现实,展望未来。问题在于,就中国历史研究特别是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而言,人们所试图理解的现实是在西方列强的强势冲击后形成的现实,而所谓的未来,几乎别无选择地就是象西方世界一样实现社会经济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于是,人们使用来自西方文化的概念工具,并以西方为赶超对象来思考研究如下一些问题:曾经非常强盛的‘天朝大国’为什么会陷入落后挨打的境地?中国又应当怎样赶超西方列强而实现自己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中国自己是否具有实现社会经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文化基础?这便是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基本问题。由此便形成了用来自西方文化的话语系统来表达明清时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变迁的这一现象。至于这种表达是否能够准确地理解和说明这些问题,显然并不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这与其说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还不如说是一个现实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换言之,当中国陷入了落后挨打的严酷境地,当中国面临着必须赶超西方列强而实现自己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严肃使命时,现实的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因素无可避免地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明清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进程。

对于中国大陆的史家而言,正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至少其理论表述是这样的)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才使得中国摆脱了长期的落后挨打的局面,并开始了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这一事实本身即赋予了中国革命及其指导理论(当然是中国共产党自己所表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无可置疑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由此形成了以斯大林的五种生产方式递进说为基础的“革命史学”范式。人们一方面以这一史学范式证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另一方面以此说明近代中国陷入落后挨打境地的原因。在这一范式中,诸如‘阶级斗争’、‘地主制经济’、‘资本主义萌芽’等成为主导性概念,并以此来说明明清时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迁。显而易见,在

“革命史学”范式中,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因素具有突出影响。可以说,革命史学正是时代流行革命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展开,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经济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成为时代的主题,由此,“革命史学”迅速向“现代化史学”范式转变。^①正如人们强调中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应当是“有中国特色的”那样,现在人们也相信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同样是“有中国特色的”,于是,人们纷纷质疑或默默放弃斯大林的五种生产方式递进说,指出这是一个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假定。与此同时,包括以研究资本主义萌芽著称的吴承明先生自己在内,越来越多的人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理论模式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有人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实际上已经异化为一种“情结”。^②与此同时,从前人们所重视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问题被边缘化了。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成为人们研究的主题。人们一方面继续探讨中国陷入落后挨打境地的原因,另一方面则是为中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寻找历史文化基础——中国显然存在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文化基础,中国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并取得了重大成就的这一事实本身即证明了这一点。与过去的“革命史学范式”一样,新的“现代化史学范式”同样使用着来自西方强势文化的话语系统来表述明清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变迁,而且往往同样也以西方世界的历史经验和文化来观照中国明清时期的社会经济变迁。只是从前人们所使用的话语系统主要来自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现在则有更多的选择,几乎所有的产生于西方世界的各种各样的关于社会经济发展和变迁的理论都可以为我所用——其中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占有重要地位。比如说,在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那里,经济发展是实物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源、技术和

^① 关于这一转向, Alif dirlik 最早指出了这一点,中国学者李文海也有精当的评论,见李文海《对中国近代化历史进程的几点看法》,《清史研究》1997 年第一期,北京。

^② 见李伯重《资本主义萌芽情结》,《读书》1996 年第八期,北京。

知识的函数,于是,人们纷纷探讨的是实物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源、技术和知识的配置状况。既然明清时期中国没有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那么,肯定是这些资源的配置出了问题。李伯重先生就认为,当时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之所以没有实现突破,没有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主要是由于就缺少煤铁等原材料和燃料,因而江南地区的早期工业化只能向超轻型方向发展,不能实现机器大工业革命,从而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不用说,如果有了丰富的煤铁等原材料和燃料煤铁等原材料和燃料供应,那就应当会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总之,从前人们要论证的是中国的历史发展符合马克思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所阐述的所谓的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现在人们则要论证从西方世界兴起的历史经验来看,明清时期中国的确已经具备了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文化基础,只是某些偶然的或必然的因素,中国才没有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当然,这些因素是能够克服的,而且事实证明,实际上很多现在正在克服或已经克服了。

海外学者理所当然地站在西方世界的立场上,运用自己的话语系统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进行研究和表达。在中国的大门被迫打开之前,海外学者主要根据来华传教士的各种报告、著述和书简对中国进行“想象式建构”,用萨义德的话来说,中国作为想象的异邦被‘东方主义’化了。根据他们的想象,中国或被赞美,或被贬斥。一切都与西方世界自身的现实境遇相关。十九世纪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势力在全球的拓展,其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普世逻辑开始支配人们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识。包括马克思在内,西方的学者和思想家大多把中国描述为一个愚昧野蛮、专制落后、停滞不前的国家,但西方的冲击将能够把中国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从而把中国引向现代化的发展之路。也就是说,中国根本不可能凭自身的力量走向资本主义,走向社会经济的现代化。韦伯在他的名著《儒教与道教》中,中国根本就不存在象西方世界那样的走向资本主义的社会学基础,而儒家的经济伦理使中国人在经济生活中不可能有构成现代资本主义重要精神基础的形式

化理性。^①所有这些思想，直接构成了后来费正清的“冲击——回应”理论模式的先驱和基础。在费正清那里，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法律宗教、思想文化都使中国无法走向社会经济的现代化，西方力量的冲击对中国停滞的传统产生了决定性的改造作用，引发了不断的社会革命，使中国逐步走上现代化的发展之路。显然，中国只是西方世界现代化的波及对象。对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者来说，人们同样发现了中国与西方世界的不同，他们认定中国的确不可能凭自身的力量走向资本主义，走向社会经济的现代化。中国要走向社会经济的现代化，西方力量的冲击（包括来自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冲击）是不可或缺的。其中最著名的是帕金斯的“停滞论”、伊懋可的“陷阱论”以及黄宗智的“过密化论”等等。这些说法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明清时期，中国之所以没有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是因为实物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源、技术和知识的配置严重失衡。

随着现代中国的崛起，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发现，象费正清那样把中国视为西方世界社会经济现代化的波及对象是不恰当的，中国确乎有某种自生自发的转化和创新能力。换言之，没有理由把中国内部的变化全部归结于“西方冲击”，必须从中国人自身的立场出发理解中国历史的真相，这就是所谓的“中国中心观”；也就是说，必须“在中国发现历史”。正如柯文所强调指出的那样，选择历史事实的意义取决于我们所提出问题的方式，同时也取决于我们关注时代演变的主观角度。^②当代中国的崛起使人们确信，尽管近代中国陷入了落后挨打的悲惨境地，但中国社会中的确存在实现社会经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文化基础，至于中国之所以没有自己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与其说是必然的，还不如说是偶然的，或者说，各个

^① 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2003年。

^②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2002年。

国家都有自己的发展方向和道路。^① 于是,人们纷纷从中国历史的内部来寻找中国社会经济现代化的基础,挑战前人所说的中国历史内部根本不存在实现社会经济现代化基础的一类说法。彭慕兰强调,在工业革命以前,世界上其实并无经济中心,中国和欧洲的经济至少是平行的,欧洲之所以能够超出中国并遥遥领先,关键便在于首先在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并很快波及欧洲大陆。而英国之所以会发生工业革命,最重要的有两个因素:一是丰富的煤铁资源,二是开拓了美洲殖民地——这两个因素显然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实际上,就发生和实现工业革命和社会经济现代化的历史文化基础而言,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甚至比英国的条件更好一些。但由于江南地区没有充分的煤铁资源的供应,也没有殖民地的支持,于是没有发生工业革命,没有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② 不仅如此,有人还对近代以前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唱赞歌,说在西方世界工业化以前,中国无论是经济规模还是经济发展速度方面都曾经远远地领先于西方世界,占据着世界经济的中心地位。实际上,欧洲人其实并没有什么优越的社会文化特质,所谓优越的文化特质(如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等),不过是‘欧洲中心论’的神话而已,同时欧洲人也没有什么创造,更谈不上靠自身的力量搞工业化和现代化了,西方世界一方面是受惠于中国和东方世界,另一方面是开拓了美洲殖民地才实现了现代化的。如今中国崛起了,因此必须充分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③ 所有这些,正如黄宗智在批评彭慕兰时

① 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大分流》,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2003年。

② 王国斌即特别强调中国有自己的发展道路,与欧洲的发展经验迥然不同,中国的社会经济现代化道路不会也不可能象欧洲一样。见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1998年。

③ 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北京,2001年。当然,弗兰克的观点比较极端,但着力强调工业化以前中国社会经济发达繁荣的人不少,这与帕金斯的“停滞论”,伊懋可的“陷阱论”以及黄宗智的“过密化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所指出的那样，其中包含不少的意识形态和情绪化因素。^①

史景迁曾经指出：“四百年以来，欧洲人关于中国的真实知识总掺杂着想象，二者总是混淆在一起，以至我们确实无法轻易地将它们区分开。”正因为如此，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想象往往比知识更重要”，甚至“想象的力量足以创造或超越现实。”^②这表明，萨义德决非一派胡言。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历史研究纯属空谈，不注重史料分析。实际上，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学者，大多能兢兢业业地搜集证据、解读文本，发掘新的史料，问题在于，人们对史料的利用有高度的选择性，并以自己的理念和话语系统对史料文本进行解读。

在明清社会经济史的研究领域，日本学者的努力和成果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就研究范式和基本问题而言，他们同样接受了西方的强势文化，使用着来自西方的理论话语系统。不过，日本学者并没有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论”观念，甚至对“欧洲中心论”观念有着一定程度的反感。他们似乎更倾向于做严密细致的考证工作，也就是说，他们更多地是关心究竟发生了什么？而不是为什么会发生或发生这些有什么重要意义。当然，前者与后果原是不可完全分离的，不过他们似乎相信弄清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便理所当然地能够说明为什么会发生或发生这些有什么重要意义。因此他们试图通过文本史料的搜集与整理，探寻中国历史文化发展和变迁的“真相”，相信通过文本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建构出中国历史文化发展和变迁的客观过程，由此便可以达到对历史的理解。总的来说，日本学者对于架构庞大的理论模式并不感兴趣，不会象帕金斯、伊懋可或新近的黄宗智、彭慕兰那样得出宏观的结论。正是由于日本学者长期以来特别注重文本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使他们

①黄宗智：《十八世纪的英国与中国是发展还是过密化？对彭慕兰著〈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的评论》载《亚洲研究杂志》，2002年5月号。（Huang, Philip C. C. "Development or Involution in Eighteenth - Century Britain and China? A Review of Kenneth Pomeranz's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1, No. 2）

②史景迁：《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第16-1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有自己的特色。加藤繁、宫琦市定、西岛定生、滨岛敦俊、斯波义信等人的考证和研究成果，就为世人所公认，成为进一步研究的重要基础。日本学者和欧美学者研究风格和范式形成了一种有趣的对照。

第二节 本书的选题与方法论基础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面对前面所说的明清经济史研究的基本问题，特别是面对明清时期中国没有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问题，也必须探讨中国是否具有实现社会经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文化基础这一问题。这些问题不容回避，也的确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时代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些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的终极课题。然而，过去的研究方法和结论正确吗？显然，要在理论或逻辑层面讨论上述的研究范式是否正确合理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毕竟，在他们的表达背后，都有一套比较完整（至少在逻辑上前后一致）理论系统。不用说，这些理论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当然也都有其缺陷——除了宗教教义之外，没有一种理论敢自称完美无缺。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这些理论运用的边界在哪里？他们所使用的理念和话语系统能否正确说明和理解中国明清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 and 变迁？换言之，我们是否会跌入一个以理论——而且是产生于西方世界的理论——来剪裁中国历史实际的陷阱？看起来日本学者的做法是非常可取的，即我们首先要弄清楚历史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不是用理论来剪裁具体的历史实际，而是要用历史实际来严格检验这些理论，更进一步说，理论必须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但是，这还不足以理论剪裁历史实际的危险。我们之所以要弄清楚历史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是因为我们赋予了这些历史现象的意义，不会是没有意义的为考证而考证，而意义恰恰是由理论赋予的。这就是说，当我们在叙述历史事实的时候，依然

必须要寻找到一种合适的方法论工具,使用一套合适的理论概念。在目前的情况下,向西方的社会科学寻求理论借鉴也还是很有必要的。我们认为,当代英国学者迈克尔·曼在研究社会的发展和变迁时所使用的理论方法特别值得我们借鉴。

迈克尔·曼在研究社会的发展和变迁时,特别强调了社会权力的重大意义。他所说的“社会权力”的来源包括四个方面,即意识形态的、经济的、军事的和政治的,它们是交叠的社会互动网络,而不是单一社会整体的维、层次或要素,同时,它们又是达到人类目标的组织、制度手段。也就是说,社会经济的发展深受意识形态的、军事的和政治的权力来源的影响,与这些权力来源盘根错节、难解难分,很难说哪一种因素是决定性的,一切取决于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他在叙述了西方世界的社会权力发展和变迁后指出,西方世界走向资本主义,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是一系列偶然因素和必然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① 迈克尔·曼的研究方法论之所以特别值得我们借鉴,首先是因为他所使用的理论和话语系统,如意识形态、经济、军事和政治等等,虽然也是源自西方世界,但却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也就是说,这些理论概念本身并没有以特定的经验事实作为假定前提,虽然在不同的地方其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可以有所不同,但经过抽象为一般范畴以后,便既可以用来分析和理解西方世界,同时也可以用来分析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世界。同时,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迁,离不开社会权力,包括政治和军事权力的控制和支配。实际上,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世界,政治权力、政府行为对社会经济发展和变迁的影响都是非常重要的。就西方世界的兴起而言,诺思强调,关键是建立起了一套高效的产权制度和经济组织。^② 高效的产权制度和经济组

① 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一卷,刘北成、李少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2002年。

② 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厉以平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92年。

织的建立，不仅是经济权力不断扩张的表现，显然也与政治权力、政府行为密切相关，而不是政府不作为、经济自由主义和放任主义的产物。马克思也说：“资本来到人间，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实际上，没有政治权力的强有力的支持，近代西方世界资本主义的兴起、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自重商主义时代以来，经济学家们无不强烈要求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促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政府也的确发挥了极为重要的经济功能，比如说，在立法方面卓有成效，特别是在开拓海外市场方面，政府所发挥的作用更是至关重要的。可以说，如果不充分理解政府和政治权力的作用，我们便无法想象西方世界的兴起，也无法理解西方世界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所谓近代资本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和放任主义，并不是说政府在经济方面不作为，而是说政治权力必须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服务和保障，而不是成为其发展的障碍。这就是说，经济力量在社会中的作用甚大，取得了极大的社会权力，以至于人们视“经济人”的假定为理所当然，或者按照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说法，经济力量能够自己按照最佳方式配置资源，这对西方世界的政治权力结构和政府行为特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在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专制君主在理论上有权控制全部的社会经济资源。虽然在事实上专制政府并没有如此巨大的能力来具体控制全部的社会经济资源，因而看起来社会经济资源为私人所占有和控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专制政府事实上也在法律上一定程度地保护着私人对社会经济资源的占有和控制，但由于在理论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保护与其说是保护着私人的所有权，还不如说是为了维护现存的政治社会秩序，因此，私人的所有权不可能是完整的——实际上“所有权”概念本身就是从西方世界移植过来的——经济利益的价值始终被视为是政治权力的附庸。也就是说，经济力量始终难以对政治权力构成有力的挑战，产生能够按照最佳方式自己配置的社会组织和制度。吴承明指出：“一种新的经济因素，不论是生产、流通或市场上的，只有引发适合于它的制度上的变革，它才能持续发展，否则会被旧的僵化了的制度所扼杀。制度

包括政府制定的强制性的规则，也包括社会通行的道德和习俗规则。”
“一般说，制度的良窳可以决定经济的盛衰，体制的改革可以促进经济的革命性转变。”^①既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政治权力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经济力量难以对其构成挑战，那么，政治经济制度无疑是理解明清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和变迁的关键，也就是说，离开对明清时期政治经济制度的深刻认识，仅从数量上掌握各种经济资源的配置状况，是根本无法确切理解其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迁的。

就社会意识形态而言，迈克尔·曼指出，它是社会权力的重要来源之一，因而会对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迁产生重大的影响。长期以来，西方世界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为基督教。基督教对于西方世界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变迁的巨大影响为世人所公认，以至于人们往往把西方世界称为基督教世界。马克斯·韦伯正是在基督教新教中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源泉。中国并没有象基督教那样的超越型宗教，为人们所公认并为官方所倡导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是理性的、世俗性的儒家学说。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熟悉和掌握儒家学说成为中国人挤身官僚统治集团，掌握政治权力的必要条件——至少在和平时期是这样，社会严重动荡时期当然另当别论，而这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因失去基本环境条件而只能遭到破坏。总体来说，明清时期社会环境是和平稳定的——同时，儒家学说也为传统的政治社会秩序提供了合理性和合法性证明，这就使得以伦理道德为特色的儒家思想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过，儒家学说与西方世界的宗教不同，它作为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并不意味着人们会在实际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切实地遵循，实际上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此岸的和彼岸的）像基督教那样在社会中取得巨大的、超越性的社会权力，从而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迁产生如此重大而深刻影响。中国的专制政府的统治策略往往也是‘阳儒阴法’；社会上‘满口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重利轻义、见利忘义的人也比比皆是，因此，仅仅研究

^① 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 市场与社会》，第 14、15 页，三联书店，北京，2001 年。

分析儒家学说的经济伦理难以深刻理解明清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变迁。韦伯曾经断言,中国传统的儒家经济伦理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不过他认真研究分析了其社会基础),不少学者对此提出了严厉批评。^① 我们认为,一方面,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对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对于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对于经济的增长和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的确不可低估,实际上,明清时代,无论是政府在制定有关的经济政策,还是人们在讨论社会经济问题时,往往都是从维护现存的政治社会秩序和儒家的伦理道德角度着眼的。而另一方面,我们在具体探讨经济伦理对社会经济发展和变迁的影响时,必须依据人们在实际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所遵循的经济伦理,这些伦理当然要受到儒家学说这一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重大影响,但形成于实际的社会经济生活环境之中的经济伦理与儒家的道德要求是有一定区别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只有充分认识实际的社会经济生活环境之中的经济伦理,才有可能对明清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变迁有着深切的理解。

基于以上认识,从经济、政治和伦理三个方面来描述和讨论明清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和变迁的历史事实是合理的。在经济方面,我们当然要探讨实物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源、技术和知识的配置状况,这毕竟是人们认识和描述经济事实的最有效的工具。政治方面,则主要探讨政治制度和政府行为对经济资源配置和人们的经济生活的影响,伦理方面,探讨的是实际的社会经济生活环境之中的经济伦理。这便是本文的表述框架。为了避免以西方世界的历史经验和文化来观照中国明清时期的社会经济变迁,更为了避免用理论来剪裁具体的历史实际,以

^①最深刻的研究批评应当是余英时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他指出,明清时期中国的宗教伦理是入世的,对促进明清时期商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韦伯对于中国宗教的论断缺乏事实的支持。见《士与中国文化》第441页至57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87年。杜恂诚则根本否定韦伯把儒教和清教进行比较的合理性,他说,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表明,儒家经济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并无冲突,只是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而已,因此,韦伯的结论是错误的。见杜恂诚著《中国传统伦理与资本主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上海,1993年。

上这些也是来自西方世界的概念工具只用来描述中国的历史事实，而不是用原来由这些概念工具构成的西方世界的各种理论来对照讨论它们。虽然我们也会与西方对比，但也只是在历史事实层面上进行对比。我们当然希望——实际上也非常需要达到理论的高度，但我们的理论必须建立在具体的历史事实之上，而不是看是否符合来自西方世界的某种理论。我们更不能说，如果不符合，则是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变迁出了问题，只能说的不应当来分析说明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变迁的实际。

同时,对中国而言,幅员辽阔,地区的差异性特别大,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变迁各有其不同的特征。这就意味着,要深切地理解明清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变迁,首先必须建立在对各个不同的具有社会经济发展特色的地区的深入研究之上。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变迁的研究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当然,作为一个大一统的帝国,政策的相对统一性、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相对一致性以及各地区之间经济联系的重要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必须将一个相对完整、具有自己社会经济特色的经济区域置于全国的大环境内进行分析研究。限于本人的能力,本书不可能全面描述和讨论是明清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变迁,只是以上海地区——尤其是松江府为中心展开研究,探讨其在明清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变迁,并在这个基础上理解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文化基础。之所以选择以上海地区为中心作为研究对象,是基于如下的认识:

首先,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变迁有自身和特色,同时又是中国社会经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首善之区。长期以来,人们在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时,习惯于将江南地区视为一个整体,这当然有其

令人信服的理由。^①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社会经济发达,商业市镇林立,市场经济繁荣,在社会经济、文化诸方面在全国均处于领先地位,在中央政府的财政总收入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作为江南地区的一部分的上海地区同样如此。但它又有自己的特色。比如说,与上海相邻的苏州历史悠久,长期以来是江南地区的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上海地区则是后起的。史称松江府乃“僻远之乡也,然负海枕江,山环水拱,自成一都会。”^②尤其是上海县,更是“僻处海奥”^③经济和文化风俗也有自己的特色,正德《松江府志》称“诸州外县多朴质,附郭多繁华。吾松则反是。盖东北五乡,故为海商驰鹜之地,而其南纯事耕织,故习所不同如此。”^④更为重要的是,上海地区是中国棉纺织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众所周知,西方世界的工业革命发端于棉纺织业,而工业革命又被视为是传统经济和现代经济的分水岭。^⑤但上海地区的棉纺织业无论多么的发达繁荣,它并没有凭自身的力量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上海地区的社会经济走上现代化之路是近代以后的事情,西方的冲击的确是其实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里的棉纺织业就是落后的。实际上,甚至在开埠以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尽管这时西方已经进入了大规模的机器工业时代,但这里所生产的土布依然能够在国内市场上和进口机织布展开有效的竞争。这也表明,上海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有自己的特征。从现实的角度讲,研究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变迁,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社会经济现代化的历史文化基础,认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经济工业化和现代

①李伯重在《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一文中指出:从地理条件,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及内部之间的联系,人们心目的普遍认识这三个方面来看,把明清时期的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八府及太仓州视为一个称之为“江南地区”的经济区是合理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一期,厦门。

②正德《松江府志》卷四,风俗。

③弘治《上海县志》卷一,风俗。

④正德《松江府志》卷四,风俗。

⑤罗斯托即特别强调这一点。见 W·W·罗斯托:《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现代经济的起源》,商务印书馆,北京,1997年。

化本身，显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次，从历史和现实来看，宋元时期上海兴起而成为“东南壮县”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其发达的对外贸易密切相关的，正是由于对外经济贸易的推动，上海由上海务而上海镇而上海县。明清时期，受专制政府对外经济政策的影响，海外贸易的发展受到一定影响。尽管如此，这里的商品经济依然非常发达。在海外贸易受到严重影响的情况下，对国内其它地区的贸易十分繁荣。这就是说，上海地区的经济对外依赖性历来非常强。近代以来，上海地区的社会经济走上现代化之路，对外贸易特别是国际贸易对上海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and 变迁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显然，要理解明清上海地区的发展和变迁，决不能忽视其对外经济贸易。众所周知，在西方世界的兴起过程中，人们往往特别强调对外经济贸易的重大作用，彭慕兰也强调导致中西大分流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西欧（主要是英国）拥有了北美殖民地这一极为重要的海外市场。国内外学者一般都强调对外贸易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于是纷纷严厉谴责明清政府的闭关自守政策，有人甚至强调，正是专制政府闭关自守的对外政策，使中国丧失了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良机。^①实际上，所谓对外贸易特别是海外贸易能够有效促使社会经济走上现代化之路，只不过是认可了西方世界经验的普适性而已。而说这一经验具有普适性显然令人难以置信。如果我们简单比较一下上海和广州就会发现，即便在明清闭关自守时期，广州地区的对外贸易也相当的发达，但我们并没有看到广州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更高，更没有看到这里有走向社会经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任何显著迹象，尽管珠江三角洲地区也是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显然，专制政府的对外经济政策，与其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紧密联

^①最典型的如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而新近出版的有关明清江南地区经济史著作，也同样强烈谴责明清专制政府的闭关自守政策，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一政策使中国丧失了走向世界、实现社会经济现代化的机会。如张海英：《明清江南商品流通与市场体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2000年。

系在一起,如果我们从制度和伦理的角度进行考察,就会对其功能和价值有着更深刻的理解,同时也对其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迁有着更深刻的理解。可以说,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变迁,为我们研究对外贸易和社会经济发展变迁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研究对象。这也是我们选择上海地区的理由。

最后同时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包括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学术史上的种种研究,如试图用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分析研究明清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变迁所得出的种种结论,绝大多数都是以包括上海地区在内的江南地区为研究对象的。一方面,无论他们的研究方法与结论正确与否,都使我们对明清时期包括上海地区在内的江南地区包括上海地区在内的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变迁有了更为清楚的认识。^①另一方面,我们已经指出,他们的研究范式存在问题因而其结论的可靠性是值得怀疑的,但是,作为社会经济史研究,仅仅在理论上提出质疑是远远不够的。本文试图以上海地区为研究对象,用实证的方法来探讨其明清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 and 变迁,在讨论和验证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当然,上海并不能代表全国,也不能说明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社会经济变迁具有典型性。也许上海只能代表上海。但由于上海是中国社会经济现代化的首善之区,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总是由点到面的,近代以来上海对全国的影响众所周知,因此,研究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社会经济变迁又具有超越其本地区重要的价值,这就意味着,研究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社会经济变迁非常有助于我

^①这一点,李伯重先生的一个说法显然是非常正确的,一方面,他坚决反对“资本主义萌芽”这一理论模式,指出这事实上已经异化为一种“情结”,另一方面,他也承认,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打破了长期以来盛行于西方的所谓中国历史长期停滞的种种说法,有力地回击了长期以来流行于西方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冲击——回应”模式。把研究的重心放到中国的自身,而不是简单地将中国近代的社会经济变迁归之于外部因素(即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这种做法在方向上是正确的。同时,这也使得我们的确明清时期社会生产关系的方方面面有了较为深刻的了解,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参见李伯重:《理论、方法与发展趋势 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2002年。